

医学卷

主编
夏培卓 丁达

中华百名女杰



中国医药出版社

《中华百名女杰》丛书

医 学 卷

华 夏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百名女杰丛书/夏培卓 丁达主编. —北京: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4

ISBN 7-5078-1432

I. 中… II. ①夏…②丁…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010 号

中华百名女杰丛书
夏培卓 丁 达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开本 47.7印张 1080千字
1997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001—16000

ISBN 7-5078-1432-7/1.98 (全十册)定价 60元

前 言

女人，是一缕轻柔的风，叩启着世人的心扉；女人，是一首优美的歌，展现着人间的丰姿；女人，是一座走动的钟，旋转着生活的年轮。但在这部书里，女人，不仅仅是轻柔的风，优美的歌，走动的钟，更是一部部不尽的卷帙，一棵棵不老的青松，一座座屹立的丰碑。这些女人，在男人女人共同组成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她们努力，她们奋争，她们付出，她们跨越，她们获得了成功，她们成为中国女性中的佼佼者，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成为人类文明的楷模。

在中华大地上，这样的女人是很多很多的。“巾帼不让须眉”，这是一句老话，这也是一句真话，不论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不让须眉的巾帼难道还少吗？她们，有的用生命和鲜血书写华夏民族的奋斗史，有的用科学力量推动人类历史的进程，有的呕心沥血培育未来，有的以真诚和爱心默默地对社会做出奉献，有的敢于乘风踏浪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有的饱蘸真情谱写春秋画卷，有的……有的……只可惜，这套丛书的篇幅不能尽写，更不能写尽中华巾帼人物。

这套《中华百名女杰》丛书是一部专门歌颂有杰出成就的中国女性的记实作品。全书分为10卷：革命卷、科学卷、教育卷、医学卷、劳模卷、军政司法卷、企业卷、文学卷、艺术

卷、体育卷，每卷展示10位杰出女性的风采。书中对她们的个性和风貌，她们的成长和成就，做了生动的描写，使人们能从她们身上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成就事业的品格。

本丛书的作者大多是作家协会的会员和《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教育报》、《深圳特区报》、《河北日报》、《河南日报》、《陕西日报》、《中国化工报》和中国新闻社、中国工人出版社、《金盾》杂志等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和记者。感谢本丛书的作者们，用他们珍贵的时间，流畅的文笔，写出了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给读者提供了一套可读性高的高品位读物。这套图书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也是家长对子女进行成才教育和青少年发展自己足以借鉴的读物。

夏培卓

1997.1.8

目 录

- 一切为了爱
——记儿科专家胡亚美 (1)
- 我们都会有那天
——记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司堃范 (15)
- 奉献着也很幸福
——记心内血管专家朱国英 (33)
- 白 净
——记清华大学最年轻的女教授白净 (48)
- 追忆似水流年
——记我国第一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王琇瑛 (61)
- 苦乐人生
——记雅克奖获得者郑庆斯 (72)
- 宛如平常一段歌
——记陈孝曙教授 (87)
- 走向南丁格尔
——记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林菊英 (97)
- 在试管里圆的梦
——记妇产科专家张丽珠 (107)
- 好大一棵树
——记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122)

一切为了爱

——记儿科专家胡亚美

女人不是花瓶

听一位 73 岁的老人讲述她的经历，你会感到历史像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在你眼前无声地流淌。很多离你非常遥远的人和事，会突然间变得伸手可及。在老人平静的讲述中，一扇窗子在你面前不知不觉中洞开，透过这方窗口，你看到了陌生的迷人的风景。

作为记者，所谓采访的乐趣就在于此吧。

为了采访 73 岁的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费了我很多的口舌，电话打了 10 几个，被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挡来挡去，弄得我很着急也很上火，但我终于靠着自己的真诚、执著征服了他们，从而给我亮了绿灯。以至于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用无可奈何的口气对我说：“你们记者，真让我服了。”

采访完胡亚美，我也理解了她身边那些工作人员为什么要那么不讲情面地阻拦我的“打扰”。因为她实在太忙了，国内国外必须参加的学术活动已排满了两个月，还有一些对她来说没什么用可也得去应付的杂事，一点儿“闲工夫”都没有。毕竟是 73 岁的人啦。

胡亚美是一个很随和的老太太，见了面，没有半句客套，很内行地问了问“角度”，便带我进入了她对过去的回忆中。

我觉得小学时所受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比如一棵树，长弯了，在它小的时候弄直它比较容易，若是等它长大再往直了弄，就晚了。

旧社会咱们中国学校很少，但是质量很高。我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父亲也算个资本家吧，家里很有钱。我的小学是在河北省第三模范小学——那时叫分司厅小学——上的。为什么叫分司厅小学呢？因为学校在一条叫分司厅的胡同里面。我从三年级开始喜欢看书。分司厅小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藏书很多。很多课余时间我都泡在那里看书了。

我最喜欢看的是安徒生的童话。其中那篇《卖火柴的小女孩儿》到现在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小女孩儿在圣诞节的夜里，在富人们的欢歌笑语声中，冻死在飘雪的街头。我那时便感到了这世界的不公平，使我以后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诗有了深刻的理解。我当时从那个冻死在圣诞夜里的小女孩儿，联想到自己。我不但有饭吃有衣穿，而且吃得也很好，穿得也很好。我们家有好几个厨子，变着花样为我们做吃的，所谓食不厌其精。至于四季衣服，那就更多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儿让我泪流满面。

那时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里都教育我们要有“仁爱”之心。

我家的门口，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卖烧饼馃子的小男孩儿，还有一个常年蜷缩在墙角的衣不蔽体的老乞丐。看看他们，想想自己，我更感到这个社会不公平。实际上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公平过。那个小男孩儿不能和我一样去上学，让我对他充

满无限的同情。还有那个老乞丐，我真怕他在那个飘雪的冬天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儿似地冻死在街头。我把父亲平时给我的零花钱，都给了他们。虽然我的那点零花钱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我只有那样去做了，幼小的心灵才不致于遭受更大的折磨。

当时流行着一句话：“少爷小姐是废物！”能上学的孩子家里都比较有钱，但我们不愿别人称呼“小姐”和“少爷”。

那时的小学就有爱国主义教育课。我上小学三年级时，9月19日那天，我们校长对我们说：“我们的东北三省沦陷了！”我们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们恨透了日本鬼子。我不能忘记那过去了的屈辱岁月，到现在每年到9月18日我都要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爱国主义教育，好多年都不讲了，忘了。今年又开始讲了。

过去的女人都是花瓶，是摆设，是男人的玩物，要么就是生育的机器。没文化的，长得丑的，是不值钱的花瓶；有文化的，长得漂亮的，是高级花瓶。大多数的女人也乐意作花瓶，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有钱男人的身上。

我从小就对花瓶式的女人看不惯也瞧不起。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为自己创造幸福的生活。我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可我却穿得很朴素。我父亲带我去别的有钱人家作客，有人见我故意穿得那么“贫穷”，就笑话我，我非常生气，从此就再也不去那家玩了，再也不理那个笑话过我的人。

我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作教师和医生。我觉得再也没有比教师和医生更神圣的职业了。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医院看一个病人，我被那里的碘酒味深深陶醉了。还有穿着一身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的女医生，我觉得她们简直神圣得不得了。那时

我便下决心，等大了，作个面带微笑的女医生。

那时的中小学就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育教育放在首位，还有劳动教育。我们的小学校有一大块田地，每个班分一小块儿，我们在上面种庄稼，学自然，自己劳动，自己收获。我们家离小学校近，秋天收获了，老师带领我们，把庄稼弄到我们家，玉米啦，地瓜啦，煮熟了给大家吃，香极了。

我的初中是在崇慈中学上的。我在哪方面都不甘落后，学习、体育、音乐、劳动样样不甘人后。虽然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但我身上没有一点资产阶级小姐的气味。

上初一时我考了个全年级第一名，学校免了我30块钱的学费，父亲知道了很高兴，奖给我一个200块钱的高级照相机。我挂着这台照相机，给老师和同学照了很多照片。只要学校有活动，我就跑前跑后地为大家照相，照出很多效果不错的照片。

七·七事变那年，我正上初中二年级。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他们占领了东三省还不甘心，又把魔爪伸到了华北平原，所以我们一提日本鬼子，都恨死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的课程表里多了一门课：日文。因为恨小日本鬼子，所以连“日文”也一块儿恨了，所谓的“恨屋及乌”吧。上日文课时我们故意捣蛋，出怪声，出怪调，气老师，结果什么也没学会。现在想想，日文也是一种工具，学会了还是有很多用处的。那时却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儿。

高中我是在慕贞中学上的。

我初中和高中上的都是教会学校。教会教育人们要爱世人。

中学的旁边有一个教会办的医院，女医生们不仅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为别人解除痛苦，让我非常羡慕，原来妇女不求人照样活得很好。以后我更坚定了长大后从医的决心。

我对咱们中国人很多不良的习惯看不下去，比如随地吐痰，“砰砰”地开门关门，大声喧哗，等等。这些都是极没教养的表现。我上小学时，就有“生活指导”这门课，教育你怎么生活，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说话，做事，走路，甚至穿衣服，都教。不知现在的中小学里有没有这门课。

1941年9月至1941年12月我在燕京大学医预系，校长是司徒雷登。毛主席有篇文章题目叫作《别了，司徒雷登》，就是那个司徒雷登。后来我又转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

1946年我正上大学三年级就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人参加革命，绝对不是为自己。那时我父亲老劝我去美国留学，我怎么也不去，他很生气，表示难以理解。他哪里知道，那时我已是在党的人了。上一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当时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都属于地下党城工部，城工部的头儿是刘仁。当时地下党开小组会，都是在我们家。因为我父亲是个有钱的资本家，反而更安全。崔月犁和我父亲很熟，我父亲却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在他的眼皮底下“闹革命”。

大学毕业是在1947年。毕业后我就去北平私立儿童医院作了住院医、主治医。医院是诸福棠先生个人的，创建于1942年。1952年他把医院捐献给了国家，改名为北京第二儿童医院，1955年与北京第一儿童医院合并，组成北京儿童医院。诸福棠教授从1955年至1982年，是这所医院的首任院长，我是从1982年至1989年的第二任院长，樊寻梅是第三任院长，我现在是名誉院长。

苦难的历程

在采访胡亚美教授之前，我从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造反派们揪着头发，把脑袋往墙上撞，造成了后来经常性的头痛。这也是他们不愿我采访她的原因之一，“话说多了她就头疼。”他们说。于是我知道了她在文革中有着苦难的经历。所以在采访她时，我特别提出：“请讲讲您在文革时的经历。”

老教授在讲述她经历过的恶梦般的文革时，语气显得很平淡，讲的好像不是自己。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刘仁就被揪出来了。当时说刘仁是特务，是叛徒。我参加地下党时，刘仁是我们的头儿。说他是特务，是叛徒，那我们就一个也跑不了了，全成特务和叛徒了。那时候说你是特务是叛徒，你不是特务也是特务，不是叛徒也是叛徒。就这么荒诞。

刘仁一被抓，我就知道我早晚也得被抓起来。当时我赶紧找了一本《红岩》看，学习江姐他们在面对敌人审讯时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学学他们对付审讯的办法。现在北京不是正在举办《红岩魂》的图片展览吗？办得好。

在造反派抓我之前，我爱人已被他们抓起来了。我爱人是我燕京大学时的同学，大学二年级便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可解放后的历届政治运动，他都没躲过挨整。

抓我是在一天深夜 12 点。当时我正趴在被窝儿里看《红岩》，宿舍的门被一脚踹开，一群造反派拎着皮带就进来了，让

我跟他们走。我说为什么要跟你们走？我不跟你们走，他们说你是特务是叛徒我们要审判你，我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他们说你就是特务就是叛徒，我说你们拿出证据来，他们说去你妈的蛋吧，就拉我走。我抓住门框，就是不跟他们走。他们就揪着我的头发“咚咚”地往墙上撞，野蛮极了，直到把我撞晕了，才又拉又拽地把我拖到了儿童医院的地下室。等我清醒了，他们就开始审判我，好多人打我的脑袋。后来我就抽风了，手脚痉挛、口眼歪斜，抽了3天。很厉害，也挺吓人。我知道我是颅内出血了，撞的，打的。我留了遗嘱，说如果我死了不是自杀，是被人打死的。我命还算大，没死，一直活到现在，挺结实，73岁了，还照骑自行车。但自从那次，我就落下了抽风的毛病，一发烧，就抽，抽了3年。现在我的记忆力极坏，常常是有人和我走对面，很亲热地打招呼，我却想不起他是谁，什么时候认识的，在哪儿认识的。还有看书，一本书看了好长时间，发现里面有自己划的红道，才想起昨天或上午刚刚看过。

我被造反派们关了一年，过了一年非人生活。一年后造反派让我擦地，扫厕所。现在我见了墩布和扫帚就有一种亲和力，全是因为那段特殊的经历。我把地擦得干干净净，厕所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好多年轻大夫，在给病人看病时遇到疑难病症，没把握，就跑到厕所去悄悄地问我，我也就在那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里为他们解答问题。

扫了一年厕所，1969年我被“发配”到京郊延庆县的大专科公社，接受改造。那地方是山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虽然生活上苦了点儿，但是能和农民们在一起，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参加过“土改”，参加过“四清”，参加过西北的医疗队，我觉得一个医务工作者了解群众、了解农民是非常重要的，只有

懂得了百姓的疾苦，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曾建议所有年轻大夫至少下乡一年，体会一下农村实际状况，结果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还有人劝我少提这种得罪人的建议，可我始终认为，一个年轻人不论干什么，了解社会，了解国情，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延庆县大专科公社有一个会计，因为一点儿小事儿想不开，自杀了。我一听说这件事，连夜趟河从住处跑到那个会计家去抢救。到那儿一看，人快死了。他嗓子眼儿堵了一口痰，下不去也上不来，我就把听诊器上的皮管儿拔下来，一头儿插进他的嘴里，一头儿含在我的嘴里，愣是给他把痰吸了出来。会计活了。公社的人要写表扬稿表扬我，问我：“你当时不怕脏为一个快死的人吸痰。你是怎么想的，你想的是毛主席的哪句话？”那个年代，只要有人干一件好事，准说是想起了毛主席语录，很滑稽。我说：“我为病人吸痰这件事和毛主席没有关系。我要是再去想毛主席，想他的语录，病人早死了。我所做的，是每一个合格的大夫都应该做的。”

我的话把公社的人吓了一跳，他们说你这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说我说的是实话，你们非要让我说假话，我不会。那时候干对了什么事，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偏不那么说。我的性格让我在那个年代里吃了很多亏，没办法，改不了。

北京儿童医院第一任院长诸福棠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是他的学生，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知识和技术，更学会了如何做人。他为了报效国家，捐医院，捐钱，捐房子，编著360万字的医学巨著《实用儿科学》，文革时期他挨整挨斗挨嘴巴子，仍在忘情地著书。所以说，一个人的人生目的若是很明确的话，心里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人民，那么他就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在大专科公社时，一个妇女在做饭时，把小孩生在了裤子里。这个妇女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结果造成孩子破伤风。邻居把我叫去了，可我手里没有破伤风血清。当时只有县医院有，大专科公社离延庆县城有100多华里，全是山路，派人去取，得耽误很长时间。我就让人从公社往县医院打电话，叫医院的人把药让长途公共汽车的司机捎过来，司机又把药转给乡卫生员，卫生员再给我，那时的人还讲助人为乐，没耽误事儿。可小孩儿的娘没奶，我去公社的商店，见那里正好还有一袋奶粉，就买了下来，喂婴儿吃。小孩儿的娘缺心眼儿，不会喂孩子，我只好每隔4小时就喂孩子一次，夜里也睡不好，老想着这件事。这个破伤风的孩子终于好了，活了。这在当时当地简直是一个奇迹。那地方迷信，说刚生出的小孩儿破伤风是因为他前世欠了债，要脸上抹了灶灰，扔进猪圈，让猪吃掉。这个孩子活了，她的父母感动得什么似的。前年我回了一次大专科，那个孩子已经上高中了，见了我，亲热得不行。有时间我还想再回那地方看看，有感情。可总有事儿，走不了。

全都为了爱

从50年代开始，胡亚美对危害儿童健康的营养性贫血进行了仔细观察，制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小儿营养性贫血的治疗方案和预防措施，总结出缺铁性贫血及大细胞性贫血的临床特点和治疗规律，解决了营养性贫血的治疗问题。这些研究成果的论文登载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向全国推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营养性贫血治疗的经典论著。

60年代，婴儿腹泻病一度严重危害幼儿的生命，胡亚美又

把研究重点转向腹泻病,开展了小儿中毒性消化不良的病原学、病理生理和临床特点研究。她结合当时中国儿童的特点,制订了有效的输液方案,总结出“先盐后糖,先快后慢,先浓后淡,有尿给钾”的十六字输液要点,推广了关于补液的理论和各种脱水性质的补液方案,使该病的死亡率由 20% 下降到 1%。

70 年代以后,胡亚美又把目光瞄准了小儿急性白血病,把研究重点放在突破白血病治疗的“禁区”上。当时小儿传染性和营养性疾病的发病率已明显下降,而恶性肿瘤在城区 5 至 14 岁的小儿死亡原因中已上升到第一位,白血病的发病率又占恶性肿瘤的 30% 至 40%。这不仅影响到千家万户,也关系到计划生育这项国策的实施。于是,胡亚美开始对小儿急性白血病进行治疗和研究。

白血病系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疾病,有“血癌”之称。白血病细胞在骨髓及其它造血组织中呈恶性克隆性增殖,并浸润全身及各组织器官,严重损害患儿健康,威胁患儿生命,其病因至今尚未完全了解清楚。白血病分为急性和慢性两大类,儿童白血病以急性为主,约占 95% 以上,其中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高达 76% 以上。胡亚美在对白血病多年临床及科研的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并广泛吸收国外先进治疗方法,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制订了一整套白血病的治疗对策及方案。在对淋巴性白血病和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的治疗过程中,因为采用了胡亚美改进后的方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血中残留白血病细胞是导致复发及产生耐药的可怕祸根,必须予以彻底消灭。为此,胡亚美进一步提出早期大剂量强烈联合化疗的治疗原则,强调早期诱导治疗是整个治疗的关键。这一方法尽可能在 2 周内达到完全缓解,以期最大程度杀灭体内

白血病细胞，使残留白血病细胞降至最低水平，防止耐药细胞的产生，杜绝复发现象。

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准确掌握患儿病情的变化，胡亚美带领研究生着手开展了对白血病的科学研究，应用免疫学、分子生物学技术，采用流式细胞仪、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等先进设备及手段，保证了白血病的准确分型，监测微量残留白血病细胞，从而有可能详尽了解掌握每个患儿的病情，实现了治疗方案的“个体化”。

胡亚美不仅仅满足于提高白血病患儿的存活率，而且为患儿高质量地生活而努力。她考虑到白血病对机体造成的损害以及化疗、放疗的毒副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的科研观察，发现治疗对患儿智能的损害与颅脑放疗量及甲氨喋呤鞘注次数成正相关，颅脑与睾丸放疗还会影响患儿身高和骨龄发育，联合化疗对患儿性腺也有一定损害等。胡亚美因此及时调整了治疗方案，如减少某些毒性较大的药物，改变给药途径及时间，小剂量长期服用改为大剂量冲击治疗，缩短维持治疗时间等，从而向治愈白血病，提高生存质量的目标大大前进了一步。

白血病确属难治性疾病，疗程长达3年之久。坚持治疗，定期复查十分重要。但白血病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出院后很难掌握其病情变化及治疗状况，部分患儿常因此复发，甚至死亡，往往前功尽弃。胡亚美等同志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组织专业人员开设白血病专业门诊；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情况均记录在案，并绘制成图表，使治疗过程一目了然；定期追踪随访，指定专人负责；定期与家长联系，督促其坚持治疗，从而保证了患儿得到及时、正确和持续的治疗。

白血病虽已成为可治之症，但要达到治愈，患儿多须长期